

# 烽烟鸭绿江桥——不朽的抗美援朝红色印记

梅不争

鸭绿江自长白山南麓而下，经800公里入渤海，分中朝两国而成界河。73年前，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自辽宁丹东、宽甸和吉林集安、临江等地跨江赴朝，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横江上的座座桥梁，见证了英雄的出征与凯旋，饱经战火硝烟，印刻着光荣的记忆。

## 一、鸭绿江桥概述

鸭绿江上桥、下桥。两桥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下桥建成于1911年，钢混结构，中段为旋转式钢梁，可旋转使船只通过。上桥建成于1943年，由近朝鲜一侧6孔平弦桥梁和近我国一侧6孔吊弦桥梁构成，总长940余米，如一条钢铁长龙横卧江面。下桥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被美军炸毁，现仅存我国一侧4孔桥梁，由此亦称“鸭绿江断桥”。上桥经过修复使用至今，199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40周年之际，我国丹东和朝鲜新义联合将其命名“中朝友谊桥”。

第一、第二铁路便桥。第一铁路便桥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大沙河入江口，第二铁路便桥位于振安区沙河口。1951年5月，两桥以及相连的便线铁路建成通车，成为作战物资和兵员重要通道。第一铁路便桥因处在鸭绿江主航道，已于战后拆除。第二便桥长约500米，江面上今可见20组、每组用百余根圆木捆束而成的木质桥墩。

马市浮桥。该桥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1950年10月修建，为木结构列柱桥，全长约500米，宽6米，共有20座木结构桥墩。桥面贴近水面，落潮时浮出，涨潮时淹没。著名的历史照片《跨过鸭绿江》就取景自马市浮桥。战后该桥废弃不用，桥面亦被冲毁，桥墩至今仍留在水中。

上河口铁路桥、下河口公路桥。两桥位于辽宁省宽甸县。上河口铁路桥建成于1940年，桥长673米，由于地处深山，两岸地形复杂，加之防空力量保护，虽亦曾被炸坏，但很快得以修复，整个战争期间这座铁路桥始终保持畅通，战争结束后，铁路线停运，该桥今闲置不用。下河口公路桥1942年建成。1951年11月，下河口桥在敌机猛烈轰炸下，桥体严重毁坏，中间7孔、长约200米桥面被炸断落入水中，此

后再未修复，成为鸭绿江上又一处断桥。

集安鸭绿江铁路桥。位于吉林省集安市，1939年建成，全长590米，共20孔。桥体为钢架结构，混凝土桥墩，在铁路桥上方还建有钢架花梁，起到稳固桥梁和提高轨承载能力的作用。

临江鸭绿江大桥。位于吉林省临江市，1935年建成，全长496米，共18孔。抗美援朝时期，靠朝鲜一侧第二孔桥洞被美军炸坏，1955年得以修复，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到残留在桥梁铁架上的众多弹孔。

## 二、战火中的桥

桥梁作为交通大动脉的咽喉，对战争影响至为重要。为切断供给，美军对鸭绿江桥实施近乎疯狂的轰炸。“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下令：如果情况允许，作战飞机的飞行员可以飞到油干力竭的时刻，以最大的力量摧毁中朝边界上朝鲜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由于敌我武器装备水平存在巨大代差，为了建桥、修桥和保桥，志愿军战士运用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利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条件，展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围绕桥的战斗成为抗美援朝战争总体进程的缩影。

1950年11月初，美军出动600余架飞机对鸭绿江上的桥梁进行大规模轰炸。鸭绿江下桥就在此次轰炸中被拦腰炸断，桥体断面钢结构被高温燃烧扭曲，上桥朝方一侧钢轨被炸断，桥面燃起冲天大火。危急时刻，铁路工人、工程兵部队奋不顾身扑灭火焰，冒着敌军战机不断袭扰抢修桥梁和铁道，于次日拂晓将上桥修复，在战事最紧要关头保障了这条干线的通畅。这是江桥保卫战的一个缩影。在战火硝烟中，英雄的志愿军铁道兵、工程兵顽强奋战，数以千次抢修、抢建铁路桥梁，敌炸我修、随炸随修、白天炸晚上修，车辆不足就人畜同上，硬是在复杂地形上完成了现代化工具难以完成的保障任务，保护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浮桥因为工艺简单、取材便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多次建造，包括马市浮桥在内，总数达到十余座。有些浮桥甚至建在水面以下，水深不至于没过汽车的排气管，在桥面两边拉上绳子做上标记，引导车队通过，为了掩护浮

桥，有时在旁边架起假桥吸引敌机。此外还有更灵活轻便的舟桥，只需要半个小时，工兵就可以将一座跨江舟桥架设或撤收完毕。修建马市浮桥正值初冬，江边气温降至摄氏零度以下，官兵们无所畏惧，每人喝上一大口烧酒，就跳进冰冷刺骨的江水中大干起来！1951年3月，集安鸭绿江大桥遭到敌机轰炸，严重损毁。江桥附近村民，不分男女老少，自发组织起来，跑回家中将自家的木料、大小门板都拆卸下来，扛到工地备用。小伙子们纷纷跳入刺骨的江水中组成人墙，配合铺设工作，一时间号声、喊声在鸭绿江边回荡……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我空军和高炮部队沿江严密布防，组成完整防空体系，加之苏联空军参与协助，敌机再不能肆无忌惮地对沿江大桥和我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有力保卫了大桥安全。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不仅没有断绝，运输能力反而越来越强。此时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同样风起云涌，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各类物资生产不断提速，通过鸭绿江源源不断进入朝鲜，前线部队装备水平和弹药供给状况不断提高，战势日益朝着有利于我军方向发展。

## 三、从江桥，看斗争

包括江桥保卫战在内各个战场、各个领域的争夺，都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组成部分，共同决定了最终胜利的归属。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桥保卫战生动阐释了这一历史逻辑：敢于斗争是战胜风险挑战的前提，善于斗争是战胜风险挑战的保障，勇气和智慧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使自身变得强大，成为保卫桥梁和国土安全的根本保障。

## 四、江桥的保护

鸭绿江断桥与下河口公路桥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几座鸭绿江桥也陆续



鸭绿江上桥(左)、下(断)桥(右)(抗美援朝纪念馆供图)

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正加大力度，对座座江桥开展保护规划、环境整治、展陈提升，保护管理条件日益得到改善。

作为我国境内（或与朝方共管）最具代表性的抗美援朝战争遗产，鸭绿江桥的价值十分突出，保护的意義不言而喻。上述鸭绿江桥的管理使用目前存在三类情形：一类仍在发挥作用，如鸭绿江上桥、集安铁路桥；一类原始功能已经丧失，改造后用于展览展示、旅游观光，如鸭绿江断桥、下河口桥；一类已毁弃、残损甚至全无痕迹，如第一、第二铁路便桥和马市浮桥。保存状况因桥而异，保护方式在遵循文物工作普遍规律的同时，也应分类施策、符合实际。

对于第一类桥梁，继续发挥交通运输功能显得尤为重要，不能忽视安全性和实用性，在尽可能保护真实性、完整性的基础上，可以接受对桥梁结构进行一定的改造，对建筑设施和材料进行适度替换，使之在“活”态下得到有机更新，与时代共同发展。对于第二类桥，在开发红色旅游过程中，应着力发掘和展示其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核，尽可能保护桥的历史风貌，并且要注意保护展示与核心价值相契合、最具说服力的关键细节，如桥身上的累累弹孔、焚烧痕迹、扭曲的桥体等等，加强解说和阐释，让游客身临其境、产生共鸣，深刻体会战争的激烈与残酷，理解军人的奉献与牺牲。

# 湖南出土简牍：珍贵的历史见证，丰富的文化宝藏

管震

从战国至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千百年间，竹木简牍作为主要的书写载体，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信息。随着20世纪初的考古拓荒，中国简牍开始重现天日，揭示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自1901年起，中国简牍发现已超过30万枚。这些简牍的出土地点遍布甘肃、新疆、内蒙古、湖南、山东、湖北、广东等多地，从沙漠戈壁到绿洲盆地，从河畔湖边到山区丘陵，见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繁荣与变迁。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中发现了120余枚汉晋时期的简牍，这些简牍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汉晋时期对西域的经营。1930年至1931年，“西北科考团”在内蒙古、甘肃肃州纳河流域发掘了1.1万枚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的简牍发掘，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简牍发掘迎来了新的高潮。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居延新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一批重要简牍的发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涉及历史、哲学、文学、医学、地理、军事等各个领域。这些新史料对传统文献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作用，使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

进入21世纪，中国简牍的发掘和研究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湖南里耶秦简、郴州晋简、益阳兔子山简牍、江西海昏侯墓竹简等重大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时期历史的认识。同时，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等高校收藏的简牍也成了重要的研究资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南地区的简牍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从战国到三国两晋时期，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几乎涵盖了整个使用简牍的时代，这让湖南成为简牍大省。其中，长沙出土简牍最多，国家一级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馆藏简牍超10万枚（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一级文物达1223件，是全国馆藏简牍最为丰富的专题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长沙市简牍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单位，收藏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206枚、五一广场东汉简牍6862枚、尚德街东汉简牍171枚、坡子街秦简牍若干枚；湖南博物院作为省内最早开展简牍考古发掘的文博单位，主要收藏有1000余枚马王堆汉墓简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作为承担湖南省简牍文物发掘整理保护工作的主要科研机构，致力于湖南的简牍考古发掘和整理出版工作，主要收藏有慈利楚简、里耶秦简、虎溪山汉

简、古人堤汉简、益阳兔子山简牍、郴州苏仙桥简牍，总数约6万余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2007年12月入藏了一批回流香港的竹木简，总数约2100枚。

湖南出土简牍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出土批次最多，而且数量巨大，占据了全国简牍出土总量的三分之二。全省考古发掘出土简牍25批，共20余万枚。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是历年来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总数达到了10万余枚，这一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三国时期历史的认识。此外，2002年湘西里耶秦简的出土，共37000多枚，其数量也远超此前全国出土秦简总和，这些珍贵的文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时代序列完整、内容极为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湖南出土简牍不仅有战国时期的竹简，还有秦、汉、西晋的简牍，包含了大量的户籍、赋税、仓储等档案资料 and 行政、法律文书，以及各种古代典籍，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里耶秦简记载了当时的户籍管理、经济交往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情况，揭示了秦朝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马王堆汉简、走马楼西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等记录了汉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社会风俗以及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信息；而走马楼三国吴简则提供了三国时期吴国长沙郡临湘县（今湖南长沙）的人口、土地、赋税、户籍等方面的详细数据，展现了三国时期长沙人的生活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空白；里耶秦简则揭示了秦朝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况，为研究秦朝历史提供了新的突破口；郴州晋简中详细记载了西晋时期县一级官府所统计的地理物产和日常事务等。

书体样式丰富、时代风格鲜明，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湖南出土简牍是研究中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重要材料，这些简牍字迹优美、气韵生动，不同时期的简牍有着不同的书写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字使用习惯和审美观念。例如，马王堆汉简是西汉初期汉字从篆书向隶书演进的代表作品，其字形灵动飘逸、笔势流畅、精美绝伦；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字体则大多以隶书居多，草书较少，字形宽博方正，波挑分明；而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字体大多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但也间杂了行、草等书体，可谓各体兼备、绚丽多姿。这些不同时期的书法风格展示了古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多样性和发展脉络。

# 博物馆赋能特殊群体的社会教育实践探索——以良渚博物院为例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的内涵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良渚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良渚博物院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于一体的遗址博物馆。作为全面解读与阐释良渚古城遗址遗产价值的专题博物馆，良渚博物院承担着向公众展示传播世界遗产内涵，弘扬保护文物古迹的责任，并致力于搭建良渚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外延延伸网络，积极探索文脉传承和文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文化是全人类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不分国界、不分群体，每个人都有权力接触和了解全世界共享的文化。今年，第19届亚运会期间，作为杭州金名片的良渚文化无处不在，圣火采集点、火炬造型、亚运奖牌、吉祥物设计等等，都充满了良渚文化的元素。为了迎接杭州第4届亚运会，10月15日，第40个“国际盲人节”，《良良的古城世界》大字盲文版新书发布会举办，是良渚博物院致力于良渚文化普及和无障碍服务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人们精神文化追求也随之提升。博物馆作为实现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场所，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愈发显现。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契合主题“博物馆的力量”，良渚博物院发布了“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首推项目将目光投向了特殊群体。以期用良渚文明的力量滋养特殊群体的精神世界。在该计划下，良渚博物院先后举办了“文明之光的折射”特殊儿童艺术展，携手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无障碍”团队共同发起并启动了“触觉博物馆”项目。此外，良渚博物院还积极响应《马拉喀什条约》，支持出版业内首部盲人创作的盲人与明眼人共读的诗画绘本《诗人的旅途》，自主编辑盲文版良渚文化科普读物《良良的古城世界》。

青少年群体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希望与未来，是遗产地首先要关注和普及的对象。2018年以来，良渚博物院自主编撰出版“良良”系列青少年科普绘本共5册，以严谨的学术成果、童真的儿童视角、浅显易懂的科普文字、生动有趣的美术画面，科普良渚文化及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同步配套推出了音频、视频、舞台剧等，丰富传播形式，绘本主人公“良良”逐渐成为著名的良渚文化青少年教育IP。“良良”系列青少年科普绘本，也得到了青少年的一致追捧，在他们幼小的心中植入了浓厚的文化情怀。新的《良良的古城世界》大字盲文版，保持了原绘本故事情节精髓，在同一页面上将“可看”的汉字图画与“可触”的环保硅胶盲文巧妙融合。此外，还采用了点、线、磨砂面等可触元素，呈现良渚文化的经典文物，更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良渚世界。该书不仅保证了融合阅读的可行性，还使其成为视觉障碍人群与普通大众可轻松共读的良渚文化科普绘本。特别是视障儿童，他们通过“可触”“可听”“可看”“可感”等多个感官维度，深入了解良渚古城的内涵价值，真正实现了博物馆文化资源的多角



度共享。

“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是良渚博物院提出的一项长期计划，是博物馆的常规观展与社教活动之外的参与式科普教育新尝试。该计划从各类人群的不同特征入手，服务其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重点聚焦“文化共享”的理念，彰显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平等共享与人文关怀，体现良渚作为世界遗产地所承载的公共教育普及化的社会责任，增进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支持，形成世界遗产地公共教育平等化的良渚方案。

自“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发布以来，良渚博物院创新策划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教育实践探索，受到了业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以“触觉博物馆”项目为例，随着触摸展品的征集和触摸展览的推出，将文化艺术无障碍的路径拓展得更宽，延展得更长，不仅让特殊群体生活更有诗意，还为特殊人群在艺术与博物馆领域提供升学与就业的可能性，同时也丰富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和新方向。在该计划实施过程中，良渚博物院积极完成了一系列的软硬件完善提升，比如在场馆无障碍服务方面，组织社教专员和志愿者开展手语讲解接待培训，实施无障碍服务设施改进提升，为特殊人群提供更方便的参访接待服务等；在共建和合作方面，努力尝试通过“良渚文明特展”配套研发社教品牌课程、文旅研学游戏、良渚文创产品等，跟着外展走出浙江甚至走出国门，以期在更广泛的地域和群体中以更多元的传播方式推广良渚文化；在社教课程的品牌化打造方面，正积极研发一套标准化、精品化的研学课程体系和互动体验项目，参与受众也将扩展至各年龄段和各类人群。

良渚博物院作为遗址博物馆和世界遗产地，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播载体和展示窗口，不仅承担着博物馆的展览和社会教育使命，也承担着



考古研究学术成果科普转化的重要职责。目前，“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下的更多项目也在持续推进中，良渚博物院将竭尽全力用爱心和真情传播中华文明，将文化资源和空间广泛赋能至更广阔群体，不断激发文化遗址和考古遗址的创新活力，实现遗址博物馆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功能互补，持续致力于提供全民化、无障碍化的博物馆教育服务，以更包容和更可及的方式，与更多元的群体一起，为更多人点亮了解良渚文化的灯塔，打开了解良渚文化的窗口，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传承、探索、讲述好良渚故事，传播好璀璨的中华文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成果的博物馆化解码与传播研究”(21CKG025)阶段成果